“此地江河浩荡——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回顾展”展厅一角。
本报记者　**张鹏禹**摄

老舍《四世同堂》手稿。　　**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

浩瀚的文化宝库 醒目的文学地标

——中国现代文学馆迎来建馆40周年

本报记者　**张鹏禹**

98万件馆藏珍品、21万件文物留存文学记忆，785件国家珍贵文物诉说文脉传承，142个作家文库描绘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壮阔征程……4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藏品的征集保护、科学研究、陈列展示、教学研究、阐释传播、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日益成为中国文学突出而醒目的标志，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积淀厚重而坚实的基础。

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迎来建馆40周年。正如“人民艺术家”王蒙所说，“中国现代文学馆对于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中国作协意义非凡，它是我们的一座宝库、一个标志、一座宫殿、一种展示、一台扬声器。”请跟随记者的脚步，通过“此地江河浩荡——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回顾展”、建馆40周年座谈会等系列活动，走近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前世今生。

为纪念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象群制作并向该馆捐赠鲁迅塑像《野草》。
本报记者　**张鹏禹**摄

富藏珍贵文学记忆

“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1980年12月27日，巴金正式发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

“晚年的巴金，身体力行，将筹办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人生中的最后一项工作。”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巴老提出建立文学馆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这是为国家、为民族保存文学记忆、情感记忆。”

1981年3月12日，巴金的《创作回忆录·后记》以及配发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议》在《人民日报》刊载，得到作家们的广泛响应。茅盾、曹禺、叶圣陶、冰心、夏衍、丁玲、臧克家等著名作家纷纷表示将鼎力支持，捐出自己的手稿、藏书、资料等。经过几年时间的筹备，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宣告成立。

在3月26日开幕的“此地江河浩荡——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回顾展”上，展示了这座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馆是如何从巴金最初构想的文学资料馆，到集茅盾故居、图书馆、档案馆、展览馆、研究中心及博物馆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学殿堂的不凡历程。

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杨沫《青春之歌》手稿、罗广斌《红岩》手稿、王蒙《春之声》手稿、张洁《沉重的翅膀》手稿等，还有巴金捐赠的林徽因致沈从文信、丁玲捐赠的巴金致丁玲信、冰心捐赠的臧克家致冰心信等，以及唐弢的书椅、老舍在英国任教时录制的汉语留声机唱片教材《言语声片》等实物。

记者注意到，展品中有一件外表斑驳但仍不失精致的衣箱，它的主人正是朱自清。这个衣箱曾陪伴朱自清多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朱自清一家被迫离开清华园，开始南下流亡之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7年中，衣箱陪伴朱自清左右，由于生活拮据，他常拿出里面的物品去典当。穿越80多年时光，衣箱见证着朱自清坚守岗位、弦歌不辍、清贫坚韧的品格。2024年，这件由朱自清之子朱乔森捐赠的衣箱，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从‘藏之名山’到‘传之世间’，文学馆的万千珍藏凝聚着数代作家、学者及其家属化私为公的文化胸襟。”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说。

“如今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仅发挥着产品库、资料库的作用，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在3月26日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座谈会上，该馆原馆长陈建功表示。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核心期刊，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其一直坚持的客座研究员制度，发掘延揽了一批中青年批评家，不少已成为当下文学研究和评论界的中坚力量。

活态展现文脉延绵

建馆4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束沛德，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作协主席毕飞宇，上海作协主席孙甘露，阿英长孙钱荣毅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珍贵文献。

毕飞宇捐赠的小说代表作《玉米》手稿，清晰保留着作者反复涂改的墨迹与编辑批注的各色标记。孙甘露捐赠的小说代表作《信使之函》手稿同样留有或潦草或简洁的修改痕迹。他提到，写作这部作品时常去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购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杂志。这本杂志的名字给了自己灵感。“手稿入藏对我而言是一种荣幸，在30多年前我20多岁时，哪会想到有一天中国现代文学馆会收藏我的手稿。”

四十载聚沙成塔，众木成林，从巴金等老一代作家的慷慨捐赠，到当代作家手稿、图书、资料等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一代代作家及其亲属、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这座一级博物馆以其独特而鲜明的标识，成为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窗口。

如何妥善保存、有效利用珍贵藏品，中国现代文学馆下了不少功夫。建设恒温恒湿库房、实施数字化扫描工程等，让茅盾《子夜》手稿与《四世同堂》手稿墨迹等珍贵文献得以永续。王军谈到，在数字化建设方面，该馆优先开展书稿、书信等核心文献的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实现10%馆藏的数字化转化，其中作家手稿与书信为数字化重点对象。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40周年之际，该馆还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藏珍贵文物图录》《欲书花叶》《推开文学之门》等图书、文创，让更多读者可以通过高清图片和详细解说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学故事。

在展陈方面，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现代作家书房展”是读者最爱的打卡地之一，这里还原了冰心、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等10位作家的书房，带读者走进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冰心书房书桌上摆放的海螺、小瓷猫等工艺品，花瓶里怒放的玫瑰花、天蓝色的格子床单等布置，流露出作家的生活情趣。书房还有一个装满信件和明信片的大玻璃柜，收藏着全国各地读者写给冰心的信。

馆藏珍贵文物勾勒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与时俱进的文学策展更让读者得以与新时代文学同行。202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之际，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与“‘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两大展览。前者以沉浸式布展展现新时代文学繁荣气象，展出《人世间》《三体》等影视化作品的手稿与剧本，辅以“书山”艺术装置和人工智能互动体验；后者依托《林海雪原》原著搭建沉浸式场景，读者不仅能在飘落的雪花中感受小说世界的冰天雪地，还能在屏幕上观看烈士杨子荣的视频，并展开趣味性的“黑话”互动。

2024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及其所属的茅盾故居参观人次突破27万，各地巡展参观人次达到33万，在广大观众心中播下文学的种子。

历史小说的文学品格

——谈聂茂长篇小说《王船山》

谭桂林

聂茂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团结出版社**）或可视为湖南文坛近年来的重要收获。湖南文学传统中，有乡土写作的维度，也有历史写作的维度。从乡土小说看，从《边城》到《山乡巨变》，再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湖南产生过不少乡土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而在历史写作方面，从改革开放初期任光椿的戊戌变法史书写，再到唐浩明《曾国藩》等以湘军史为题材的作品横空出世，几代人共同建构起湖南历史写作的传统。历史人物的书写越往上走，时代背景就越模糊，生活细节甚至精神动向也就越难把握，对写作者学识和想象力的要求也越高。比较而言，谭嗣同、曾国藩是近代人物，生活背景与精神背景相对清晰，《王船山》的历史背景在明清之间，从文献整理、日常想象到人物构型，写作难度更大。梁启超在梳理近300年中国学术时指出，王船山的思想虽然经过曾国藩等人的整理已经复活，但光是整理的复活还不够，真正的复活是精神的“符合”，而“精神的符合只怕还在今日之后”。梁启超的这一断语已是百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王船山的精神复活不仅表现在湖南学者对其学问的研究上，而且也应该表现在用文学手段塑造王船山形象，以揭示其精神世界这方面。

怎么写历史小说？百年来的文学史争议不断。从现代文学传统看，有新编演义、据实求真两大类，总体来说，《王船山》属于后者。但是，历史叙事不应该简单局限在解释文献和确定文献的真伪，以及表现其价值等方面。历史叙事要依靠作家的知识素养和理性认知，重新获得对过去事物的新鲜感，也即我们现在常说的，用自己的思想去照亮历史的原始资料。《王船山》在这方面有其长处，它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大时代中的个人如何选择？

王船山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对岳麓书院创办者张载非常崇敬。张载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非常有名，这是儒家知识分子毕生所追崇的信仰。在明清鼎革的大时代中，王船山曾经试图要“为万世开太平”，要“为生民立命”，但后来发现“事不可为”。许多王船山传记里都记载过这一点。既然“事不可为”，王船山选择退隐著书，他对儒家文化集大成式的发扬，是一种文化拯救，具有悲壮性与崇高性。王船山的学术贡献，近100多年来已有很深的研究，这种贡献虽在小说里面是略写，但它是叙事发展的终点，也是王船山这个人物性格走向的趋势。王船山的人生抉择，展现了从立功到立言、从为生民立命到为往圣继绝学的儒家人格发展的全过程。

《王船山》赓续了中国新文学的启蒙精神。当代历史小说写作，风格与笔触各有特点。例如唐浩明的《曾国藩》，比较擅长写官场、政治，而聂茂的《王船山》重点在于写文化。鲁迅曾在他的杂文里批判过张献忠的残暴与酷虐，在这方面，《王船山》与鲁迅的批判颇有相通之处，在对农民起义军的描写方面，既突破了过去的成见，也把握住了历史分寸，体现出新文学国民性批判的精神特征。

梁启超曾说过，明末有一场大公案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说特说，这就是欧洲历算学的输入。它创造了历法改革的历史功绩，而且中外学者合译书籍不下百种。梁启超甚至认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字字是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王船山》也写到历算法改革几个人物的遭遇，在乱世的描写中，以文明交流作为一个时代特点，这是小说世界眼光的体现。这部作品稍有不足之处也恰恰在此。梁启超曾说过，在这个时间点上，以历算学作为重要标志，这是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接触最为典型的一次。这两个知识线的交集造成了中国的一种新环境，不论是生活空间还是学术空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小说如果能通过历算事件，在整体的生活氛围和人物交往的氛围里体现出中西文化、满汉文化的融合交汇，则能在更高层面上提升作品的文化价值。

聂茂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型作家，也是一位作家型学者。他锲而不舍，历时12年完成了这样一部煌煌四卷本的大著，为世人走近中国明清之际这位重要的思想家、学者、诗人、词人王船山提供了独特视角。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中外学者共论莫言戏剧文学

本报电（张鹏禹、徐昳清）3月29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创造：莫言戏剧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戏剧文学是莫言创作的重要一翼，其重要作品有《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酒香》《锦衣》《鳄鱼》等，部分作品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央华戏剧等承演，引起广泛社会反响。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来自国内学界、出版界、戏剧界的专家以及来自美国、英国、罗马尼亚、土耳其、墨西哥、塞尔维亚等国共计70余名学者参会。此外还有来自美国威廉姆斯大学的本科生，来自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和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外国留学生与会。

研讨会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表示，从2001年《霸王别姬》获曹禺文学奖，到2024年《鳄鱼》全国巡演，莫言的戏剧文学创作坚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断实现自我突破，参与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进程中。近年来，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的文学教育取得丰硕成果，以莫言、余华、苏童、欧阳江河、西川等为代表的作家老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认为，莫言是兼具戏剧艺术思维的作家，《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作品中均蕴含丰富的戏剧元素，其创作以戏剧思维拓展了文学边界，呼应了契诃夫等世界文豪的戏剧作品。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莉亚娜是莫言剧作《鳄鱼》的译者，她表示，这部融合卡夫卡式荒诞与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现代悲剧令其印象深刻。英国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全球发展与展望研究中心主任王士东分享了该校戏剧社首演《鳄鱼》的盛况，认为莫言戏剧具有较强的国际传播潜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聚焦文体差异，认为莫言戏剧以讽刺对话、立体人物群像及具象化舞台语言，直击人性本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杨扬肯定《鳄鱼》巡演引发的艺术共振，强调该剧在遵循戏剧规律的同时，通过意象化表达得到学界认可。山东高密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回溯了莫言参与茂腔改革的实践，揭示了其“在地性”创作理念，即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构建戏剧冲突，将地方戏曲基因升华为承载人类共同精神性命题的载体。

开幕式最后，莫言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他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戏剧技巧，传统小说的看家本事是白描，即通过语言和动作行为表现人物，这些元素搬上舞台就是话剧。“讨论小说不能忽略小说的戏剧性，讨论戏剧也必须关注戏剧的文学性。”

开幕式后举办了三场研讨，专家学者从戏剧融合和海外传播等角度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多位学者关注到莫言戏剧的多元融合特质。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认为，莫言戏剧以“文无定法”挑战传统规范，如《鳄鱼》结尾的独白以实验性手法打破线性叙事，形成西方“陌生化”手法与中国传统创作观的融合；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提炼出莫言剧作历史感、生活感与文学性交织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则强调其通过“假定性”将荒诞转化为真实的虚构逻辑。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邹红等学者聚焦莫言对民间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如高密茂腔的现代化运用和布莱希特间离手法的嫁接；作家李洱、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等进一步分析了《我们的荆轲》在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上的杂糅特点；苏州大学教授王尧、《文艺报》总编辑刘颋等则从语言层面阐释其“杂语”体系与难以归类的艺术范式。《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认为，莫言剧作展现了“大作家”的吞吐量，杂糅话剧、戏曲、史诗剧等风格，兼具民间底色与现代主义基因。

海外学者对莫言戏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独特视角。美国威廉姆斯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主任何曼分享了跨国合作排演《蛙》的戏剧教育实践；塞尔维亚翻译家安娜聚焦于《我们的荆轲》在贝尔格莱德公演引发的跨文化共鸣；土耳其安卡拉哈兹巴伊拉姆大学教授吉来探讨了《霸王别姬》翻译中源语言与目标文化的平衡策略；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罗靓则从女性、民间等维度解析莫言戏剧的跨文化特质。

据悉，“莫言戏剧文学国际研讨会”是“2025年北京师范大学戏剧文化周”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文化周期间还举办了莫言戏剧作品《蛙》研讨公开课、中美师生对话、校园戏剧演出、青年戏剧论坛等系列活动。

蔡崇达《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讲述与动物共同成长的故事

本报电（吴伟琦）近日，《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研讨会在京举行，多位文学界人士齐聚，对这部“既写给孩童又治愈成人”的作品进行了研讨。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是作家蔡崇达首部儿童文学作品，小说以闽南小镇男孩“黑狗达”与动物朋友交往的故事重返童年，书写成长中的暖心瞬间。

继《皮囊》《命运》等作品之后，蔡崇达将笔触投向儿童文学领域，新作延续“金色故乡三部曲”脉络，以福建泉州东石镇为背景，通过少年主人公与猫、狗、鸡等生灵的互动，铺展闽南风土人情画卷。书中既有“阿太的豁达照亮童年”的生命哲思，亦蕴含“万物有灵”的东方自然观。作家出版社社长鲍坚表示，该书已入选“中国好书”等权威榜单，阿文、法文等外文译本正在筹备中。在新媒体平台上，该书也以跨代际读物的鲜明标识受到读者欢迎。

研讨会上，评论家施战军揭示了作品的创作密码：“蔡崇达的这种跨文体写作，承袭于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以来的一种强大文脉，这一脉络由鲁迅、沈从文、艾芜、孙犁、汪曾祺等构成。鲁迅的《故乡》《社戏》、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等都是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蔡崇达的作品与艾芜的作品之间更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诞生源于双重约稿——蔡崇达女儿曾央求“写本我能看的书”，文学界亦期待其转型。作者认为，“努力写好一本儿童文学作品，就是将长辈赠予的重要财富交给下一代，交给下一个即将开始面对漫长岁月以及其中的酸甜苦辣的灵魂，这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做到的事情。”